

人文
学术

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 主编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

王 宁 著

比较文学： 理论思考与文学阐释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NLIC 2970645878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王 宁 著

比较文学： 理论思考与文学阐释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NLIC 297064587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文学:理论思考与文学阐释/王宁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6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07961-6

I. 比… II. 王… III. 比较文学-文集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5726 号

比较文学:理论思考与文学阐释

王 宁 著

责任编辑/陈 军 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0 字数 302 千

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961-6/I·601

定价: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总序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作为有建制的学科,复兴至今已历三十余年。三十年间,既有已故前辈大师筚路蓝缕在前,又有老中青几代学人薪火相继、孜孜矻矻在后,为当代中国文学学术创获了可喜的成就。为了系统回顾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三十年历程,呈现三十年间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总结中国比较文学在学科理论的推进、学术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经典个案的阐释等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与有待改进的问题,以期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历史见证,为推进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比较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的参考,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特编辑出版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文库”丛书,以飨相关文史专业的科研教育工作者、高校学生及广大普通读者。

博纳外来文化,又立足东方本土,独立思考,这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积极传统,是这一年轻学科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初叶对欧洲比较文学理论的早期译介和开拓性研究开始,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相继接纳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突破了两者的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视野,致力于沟通东西古今的文学与学术文化,为共同构建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尽的源泉;自古以来,中国外有与印度、日本、波斯等国的深远的文化交往,内有多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并存、协同发展的历史,从而培育生长出一种四海一家、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文化价值观念;近代以后的屈辱历史,激发了百年来对外国文化、语言和文学的勤奋学习,在阵痛中促成了中国文学与学术的现代转型。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萌芽、产生,正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从一开始就在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跨越了人类文化的区域界限,在古今中外的坐标上进行深入的文学研究,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悠久的历史

文化,还是屈辱的近代经验,都是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中国人文学术的丰富资源。而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更有理由和责任坚定地促进多元文化的对话、发展,推动世界文学在平等对话和交流中互识、互补、互动,和而不同,融而不一,为把各种文化与文学的特点发展到各自的极致,为丰富全球多元文化和世界文学做出中国学人应有的贡献。

三十而立,意味着既有所成,亦有所立。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来的成就,在学科理论、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译介学、文学形象学、文学人类学、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而比较文学的活力,始终来自于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它们包括传统的文艺学、中外国别文学、翻译学、海外中国学(国际汉学)、文化研究、影视研究以及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等领域。收入本丛书的诸位学人,有中国本土学者,也有的长期在海外知名大学任教工作,他们都以中国文化与文学作为根基,放眼世界文学的广阔时空,从不尽相同的学科背景出发,以各自的理论方法切入,探讨东西方比较文学的诸多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并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发展。他们不仅为学科复兴与体系建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也在价值立场、问题意识、理论阐释、方法探索和范式建构等方面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十而立,同时应立有所向,开启新的学术发展可能。丛书在回顾与总结的同时,有意关注并接纳中国比较文学未来三十年发展与提升的原创性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丛书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本丛书首批先行推出十四位学人在学科各发展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文结集,但也将关注具有完整结构性的论著:系统性论述同样是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表征,可以更加充分地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探讨。

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曾说过:虽然比较文学在它的发源地似乎已经衰落,但在其他地方却是一派欣欣向荣。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比较文学论著加盟“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丛书”,一起见证并进一步推动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未来三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学科发展,为世界比较文学繁荣做出中国学人的贡献。

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

2011年4月8日

序：我与比较文学

在匆匆将这本专题研究文集编完后，按照丛书主编的要求，每一位作者还要撰写一篇以描述自己所走过的比较文学学术道路为主题的序。这倒是使我犯难了：因为在本丛书出版文集的大多数作者都是年长我多年的学者，有的还是我的老师辈，他们的比较文学学术生涯确实是伴随着这门学科在改革开放初始的全面复兴而开始的，而对于我这个比较文学界的后来者，我的比较文学学术生涯远远没有三十年。但是若从我正式成为比较文学研究者队伍中的一员开始的1985年算起，也超过了二十年。现在反过来回顾这段历史，确实使我感慨万千：许多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这种记忆着实令我挥之不去。确实，我和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渊源实在是太深了，我所走过的学术道路也实在是充满了荆棘坎坷，令我难以忘怀。由于我在开始的阶段主要是多向前辈学者学习，自己一边积累知识，一边写一些以作家作品研究为主的论文，但总觉得那时发表的论文实在是比较幼稚，因此在编辑本文集时不打算将其收录。若从本文集的写作时间来考虑，收录本文集最早的一篇论文写于1988年，发表于同年的《北京大学学报》，最晚的一篇论文写于2008年，发表于2009年的《文艺研究》。时间的跨度正好是二十年，应该说，这二十年的时间反映了我的比较文学学术生涯。

正如我在其他专题研究文集的序中所交代的，我和国内绝大多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所走过的学术道路不尽相同：他们大多来自中国语言文学系，因为就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而言，它也确实是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一门二级学科；而我则是来自外国语言文学系的。所以若描述我和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关系，我可以用这样的字眼来描绘：若即若离，分分合合，但总也无法分离。也即，我开始是比较文学学科的门外汉，直到拿到博士学位时，也还是属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好在我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单位是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比较文学系，这就使我第一次正式进入比较文学学科的大门。回国后我仍在北大英语系任教，后来承蒙乐黛云教授不弃，聘

请我在她主持的比较文学研究所担任兼职教授,总算我有了一个双重身份。1997年我离开北大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使我正式地跨入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大门,我在那里一切从头开始,当年着手创建了比较文学研究所,1998年又领衔成功地申请到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再度领衔成功地申请到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可以说,那时我是比较文学学科内的正式成员。但就在2000年底,我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又恢复了我的老本行:英语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只是我又在清华大学创建了一个虚体性、跨院系的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尽管经历了分分合合,最终我还是和我的中国语言文学界同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共同为繁荣中国的比较文学事业,为向国际学术界推介中国文学的优秀成果而努力奋斗。就我本人的学术生涯而言,我为什么会从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走上比较文学研究之路的呢?对此我过去虽有所袒露,但并不全面,在此我不妨多做些交代。

我也和不少比较文学界的同行一样,是“文革”十年的受害者,但是我所幸运的是,我在1973年高中毕业后才下乡插队,而且时间只有两年,就赶上了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对高校教学质量的强调,我有幸被当地的贫下中农推荐作为工农兵大学生的候选人,后来由于我在中学读书时曾担任过班里外语课的课代表,在英语方面还有些基础,便通过面试进入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当时实际上我们在大学里读书的时间并不多,短短三年的学习期间,光是学工、学农和学军就占去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但是我每到一处,甚至在开会之前,总是习惯带上一个英语单词本,抓紧每一刻时间背诵单词,或阅读一些英语课外读物,或和同班同学用英语交谈,所以在三年的时间内,我基本上自学完了“文革”前大学英语专业四年的课程,并且记下了大量的笔记,也写了不少作文。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当时虽然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但却记住了不少英语单词和法语单词,因而在毕业留校后,我很快就进入了直接阅读英文原版文学作品的阶段。可说这些都对我今天的学术研究和在国外大学的演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也和今天的不少外国语言文学界的同行一样,最初进入文学研究的领域是英美文学,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美国文学,主要集中于20世纪的美国文学研究,也可以说,我是从国别文学研究逐步进入到比较文学研究的。但在此之前,有两件事对我后来进入比较文学领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80年代初,江苏省成立了美学学会,我的好友孙津在学会中担任副秘书长,他邀请

我出席了几次这样的研讨会,使我在繁忙的英语教学和英文阅读中接触到另一个充满理论思辨的领域:美学和文学理论,应该说这对于我后来专攻西方文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另一件事则更是偶然,江苏省广播电视大学需要一位外国文学教师担任学员的课外辅导,我被一位老师推荐担当了这一任务。当时电大学员的学习条件很差,他们一般周三和周六下午集中在一个大教室里听主讲教师的讲课录音,然后再由辅导教师进行辅导和答疑。尽管学员分散接受不同教师的辅导,但最后的考试却是全国统一的。这对于我这个辅导教师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不仅要把教材吃透,而且要能经得起学员的提问,此外还要经受全国统考的检验。这对我这个仅懂得英美文学的青年教师来说无疑增加了许多工作量,但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贪婪地阅读了英语国家以外的主要欧洲文学名著和许多文学史书籍,最终使得我所辅导的学员大部分都通过了考试。后来,我又接受了辅导学员文学概论课的任务,这便使我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可以说这些均对我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本和理论基础。

今天回顾起那些往事,我发现自己进入比较文学界在很大程度上也纯属偶然。1985年6月,我应邀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的美学研讨会,在会上结识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胡经之教授,他当时和乐黛云教授一起被借调到深圳大学主持中文系和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在和他的交谈中,我得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将于1985年10月在深圳举行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之前,还将举办全国比较文学讲习班,由国内外著名学者主讲。他建议我参加这两个活动,并在会议开始的一个多月前就给我发来了邀请信。但是尽管有前辈学人的提携,事情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由于我当时在外语系教授的是公共外语,与文学研究根本沾不上边,更不用说比较文学了,因此当我向系领导提出外出开会和参加讲习班的申请时,便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理由是教学任务重,我外出期间没人替我代课,另外经费也紧张,系里无法支付我的差旅费和会务费。我自然不甘心,便把申请报告递到校长那里,并声明愿意自付一切费用。最后在校长的干预下,我才如愿以偿地前往深圳出席了那次比较文学的盛会,却失去了参加全国比较文学讲习班的机会。

1985年的深圳会议上,确实是群星璀璨,大师云集,恐怕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我除了向大会提交自己的论文外,还结识

了许多比较文学界的同行,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了我的至交或同事。此外,我还有幸认识了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发生关键性影响的三位学术大师:杨周翰教授后来成了我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他在我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后才匆匆离去;佛克马教授后来成了我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合作导师,并引领我进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界和后现代主义研究领域;詹姆逊教授后来一直是在我从事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以及全球化问题研究过程中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位思想家和理论家。我也正是在深圳会议之后的1986年,毅然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杨周翰教授的博士生,从此在北京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回顾这二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我确实一直未离开过比较文学。除了在外语系讲授英美文学、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方面的课程外,我还争取用英文为本系和外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比较文学导论课或作专题讲座。我除了在清华大学指导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外,还先后在山东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指导过20多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成为高校的教学和科研骨干,有的甚至自己也成了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想到这些,我不禁有一种感觉,即使自己再忙再累,但眼看着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不禁有一种成就感。

由于我本人的学术背景,我写作的比较文学著述自然也反映了我本人的知识状况。近几年来,尽管我已在多家报刊的访谈中讲述了自己的学术著述风格,但专门讲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著述的并不多。这里谨借此机会略述一二。熟悉我的著述的读者大概都知道,我从未单独写过一部比较文学导论或概论,也没有领衔主编过一部比较文学教材,这恐怕是受我的两位中外导师的影响。但我深深地知道,我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站在学科的前沿,关注理论热点和焦点话题,跨越学科的界限,将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放在一个广阔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语境下来考察。具体落实到中国文学,我选取的切入点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因为我在这方面确实花过一些工夫,也阅读了一些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所以研究起来比较得心应手。和我的同行所不同的是,我必须尽力发挥自己的英语写作和演讲特长,不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尽可能地利用一些国际场合来推介中国文学,同时尽可能地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所以说,简单地概括我的比较文学著述风格,就是这样几个字:理论性、前沿性、跨学科性和全球本土性。也即一方面,我努力将西方最

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理论思潮及时地介绍给国内同行,并将其用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现象的分析和阐释;另一方面,努力在国际学术界著述,力求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应该说,这两点我基本上都做到了。但我深深地知道,要想在一个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精英学科内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并非一日之举,也绝非我本人能力所及,因此我还需要在今后的岁月里努力做好教学工作,培养更多更好的比较文学研究人才,使他们能够活跃在国际学术论坛,不断地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作为一位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就应该感到聊以自慰了。

目 录

序:我与比较文学	1
----------	---

第一编 理论的反思与建构

比较文学:走向超学科研究	2
比较文学的“死亡”与“再生”	15
中国比较文学的“全球本土化”历程及方向	24
“后理论时代”的西方理论与思潮走向	40
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	73

第二编 中西文学的比较与对话

西方文艺思潮与新时期中国文学	86
后现代主义:从北美走向世界	102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变体	120
德勒兹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分裂结构	130
“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后现代、后殖民与新儒学重建	141

第三编 比较文学语境中的翻译研究

录 目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158
中西比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	180
理论的翻译:中国批评话语的重构	190
“世界文学”的演变及翻译的作用	203
现代性、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构	217

第四编 接受与影响:个案分析与阐释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弗洛伊德主义变体	232
佛克马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理论思想	248
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易卜生与中国重新思考	262
惠特曼与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中的惠特曼	275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西方	284
后记	305

空间诗学图法：学文导图

第一编

理论的反思与建构

- 比较文学：走向超学科研究
- 比较文学的“死亡”与“再生”
- 中国比较文学的“全球本土化”历程及方向
- “后理论时代”的西方理论与思潮走向
- 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

比较文学：走向超学科研究

如果说,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于 19 世纪后半期诞生并有长足发展的话,那么,它迄今已步履维艰地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有人说,它已成了一门日趋成熟的独立学科,其标志是它已深入到大学的教学课堂和文学研究诸领域,各种类型的论文、专著汗牛充栋;也有人则根本否定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应有的存在价值,其理由是它至今也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及研究对象,因此距离一门独立的学科所应具备的条件还相差甚远。本文无意对这种无休止的争论发表意见,只想根据目前中国和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或模式,以打破长久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两根支柱”支撑的局面。至于这种方法能否有效地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和发展,我此时还不敢妄加推测,但至少我本人对这种方法的研究前景是抱乐观态度的。

在 1987 年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西安)上,当时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杜威·佛克马作了一个精彩的发言,其中有一段话的意思是说:现在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再也没有什么“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说,学者们所主要关心的是理论的探讨和问题的研究。也就是说,比较文学应当积极介入当前的理论探讨和研究,总是纠缠于无端的学派之争只能导致新的危机。因此,本文可以说正是朝着这个努力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何谓“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

当代文学观念的更新,加速了人们思维空间的拓展,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语言的、民族/国别的、传统的、人为的界限早已打破。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已不再能满足宏观综合研究的需要,因而超越时空观念、超越学科界限,并且超越文学自身界限的综合比较研究,已经为当代的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1975 年,在一次国际性的比较文学讨论会上,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巴利塞里(Jean-Pierre Baricelli)第

一次提出,研究比较文学不应受制于学科界限,可以从“多学科”(polydisciplinary)和“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角度,加强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他所谓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实际上只是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彼此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因而从本质上说,这种方法只不过是一种打破了学科界限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并没有突破这一既定的模式,达到文学自身的超越。在他提出这种研究方法之后,比较文学研究越来越受到新理论、新方法的挑战和冲击。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在西方也确实日渐增多,特别是它有助于研究者摆脱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孤立研究文学本身之束缚,把文学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跨文化和多学科背景下来俯视、来考察。应该承认,这种方法的提出,不仅使日益陷入危机的比较文学摆脱了窘境,而且对一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视野的开拓,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近几年来在中国出现的“文化热”和“理论热”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本文提出的超学科研究究竟在哪些方面超越了巴利塞里的模式呢?它的内涵和外延是如何规定的呢?它具体又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首先,我认为,所谓超学科比较研究除了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外,还必须具有一个相辅相成的两极效应。一极是“以文学为中心”(韦勒克语),立足于文学这个“本”,由此渗透到各个层次去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关系,然后再从各个层次回归到“本体”,求得外延了的本体。另一极则是平等对待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及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揭示文学与它们在起源、发展、成熟等各阶段的内在联系及相互作用。最后,要在两极效应的总合中求取“总体文学”的研究视野。也就是说,它的起点是文学,经过了一个循环之后又回归到文学本体来,但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本体复归,而是一种螺旋式的本体超越,得出的结论大大超越了原来的出发点,而是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实际上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熔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类比研究等各种方法于一炉,达到了多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综合比较之层次。在具体实践中,这种方法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研究,它不屑于对文学思潮流派、文学现象、文学范畴、审美符号、创作规律、创作活动、创作心理、读者阅读-接受心理、批评鉴赏等问题泛泛而谈,而是通过多方面的比较,立足于文学本身的角度,去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内在关系和相互影响;同时,也通过对各门艺术的鉴赏和比较,发现文学与其他各门艺术

在审美形态、审美特征、审美效果以及表现媒介方面的共同点和相异之处,揭示文学与这些艺术门类的内在联系,最终站在总体文学的高度,总结出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规律,进而丰富和完善文学研究本身的学科理论建设。因此,本文所提出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既是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超越和深化,同时又不同于韦勒克所谓的“文学的外部研究”那样的平行比较模式。

文学与文化

什么是文化?对于这样的问题可有多种回答,这不仅是因为各人回答的角度不同或人们对文化本身的界定不甚明确,更重要的是,文化本身的内容十分复杂,其内涵和外延也不明确,因此,目前要对文化作出一个令所有人都接受的定义实在是难以办到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探讨这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一般认为,文化包括人类历史上创造出来的所有精神财富的总和,同时,文化又涉及具体的习俗、制度及各种观念形态,因此文化是一个大的开放的系统,而文学则只是这个大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分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学自然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种文学观点、一场文学运动或一个文学流派的生成、发展乃至衰亡,总有着与之相适应的气候和土壤,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背景。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不同民族的文学,自然有着各种差异。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背景的差异自然是不言自明,即使是同属于一个文化背景的欧洲文学也并非铁板一块,它也表现出不同时期、不同国别或不同民族间的差异。例如风靡全欧洲的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就显示出了在全欧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英国达到了全盛阶段,在法国则姗姗来迟,而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歌德和席勒的“古典主义”文学。用几句话来概括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正是:德国出思想,法国出宣言,英国出作品。这也许是德国人重玄学、法国人重观念、英国人重想象的传统所致吧。这也说明,一种文化或文学思潮在异域的传播,除了具有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文化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指明了20世纪各门类艺术的总的倾向”,波及几乎整个欧美国家,同时也波及中国和日本这样的东方国家,但其程度却不尽相同:“在有些国家,现代主义

似乎对于文学和艺术传统的演变有着重要意义;而在另一些国家,现代主义似乎仅光顾了一下就扬长而去了。”^①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于西方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则更是一个“包容性的”泛文化现象,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必然涉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对这样的现象作出分析,自然也不能脱离文化的因素。因此,把文学放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下来比较,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使之不受某种固定模式的局限。

既然我们已经注意到,文学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如何做到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呢?首先,我们要看到,“文学作品中有三个主要因素:审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简而言之,审美因素是那些受到审美需要,以及作为形式结构或‘虚构’工作或无目的‘制作’的支配性决定的特征。心理因素是那些显然受到写特定作品的具体个人的创作所决定的特征。文化因素则主要是由某个时期特定社会中写出某一部作品的状况所决定的特征。当然,前两个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是取决于文化条件的,而且彼此间也密切相关”^②。因此,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文学可分为这样三个步骤:(1)文学的文化阅读,即把文学作品当作一种文化中的意义载体,通过阅读发掘出隐含在语言符号中的文化意义。(2)文学的文化批评,即把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来考察,突破文学的文本因素,把批评的层次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把批评的背景扩展到大文化系统的各个方面,给人以一种宏观的、开阔的视野。(3)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它包括历时的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平行研究,也包括共时的文学的文化关联性和文化参照系,即不仅考虑到文学内部的文化因子,而且还要探讨文化的各个方面对文学生产、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和制约的作用。总之,“文学-文化分析的特殊贡献,就在于它用任何其他方式作出解释之前,强调了一个文化的表达因素,强调了表达性‘阅读’的重要性”^③。毫无疑问,在20世纪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受到挫折后,弘扬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势必有着深远的意义,它

① 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 *Modernism: 1890-1930*, Lond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 23.

② 转引自 Malcolm Bradbury and David Palmer eds, *The Contemporary English Novel*,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9, p. 161.

③ Ibid., p. 163.